

新时代“四个伟大”对 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创新发展*

于春玲

【内容提要】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已经蕴含了“进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伟大斗争、建设新的现代性的伟大工程、推进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实现人类解放的伟大梦想”的“四个伟大”思想。这一思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运用中得到贯彻与发展，并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被进一步确证、升华和凝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将“四个伟大”从指向人类解放的无产阶级革命总纲领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治国理政新方略。

【关键词】马克思和恩格斯 “四个伟大” 新时代 社会革命 治国理政

作者简介：于春玲（1976-），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辽宁沈阳 110169）。

2018年5月4日召开的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同志指出，马克思的一生是胸怀崇高理想、为人类解放不懈奋斗的一生，是不畏艰难险阻、为追求真理而勇攀思想高峰的一生，是为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而不息战斗的一生^①，这一概括准确揭示了马克思一生的主要贡献及其思想宗旨：通过创立科学理论指导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探索构建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可能路径，最终实现人类解放的伟大梦想。这一思想宗旨转换一种表述方式即为“四个伟大”：进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伟大斗争、建设新的现代性的伟大工程、推进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实现人类解放的伟大梦想（在新时代中国表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②）。习近平同志指出：“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今天，170年过去了，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仍然是完全正确的。”^③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所蕴含的“四个伟大”光辉思想正是这样的一般性原理。时至今日，这一原理不但没有被遗忘，反而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运用中得到贯彻与发展，并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被进一步确证、升华和凝练。

一、伟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的当代转化

“进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伟大斗争”，这一思想在标志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共产党宣言》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技术与现代性’批判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6BZX028）的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5页。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3页。

③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5页。

(以下简称《宣言》)中鲜明呈现出来。恩格斯在1883年《宣言》德文版序言中具体地阐明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伟大性”与“独特性”：“(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①恩格斯的话表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不同于历史上一切阶级斗争的“伟大斗争”,这是因为:首先,它与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一切斗争——这些斗争都是以一种剥削制度取代另一种剥削制度,用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不同,它的目标是消灭私有制,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其次,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不是基于“一个阶级”的“利益”的斗争,而是为了“整个社会的解放”的斗争,代表的是全人类的利益。

至关重要,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存在于现实领域的现实斗争,而非仅仅观念领域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反对把斗争局限在观念领域中的做法,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强调指出,青年黑格尔派“只为反对‘词句’而斗争”,不可能实现人的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②,只有通过现实的途径、借助现实的力量才能完成。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主要还是从“理论”上分析和论证“现实斗争”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但从1846年开始,他们越来越重视把自己的科学理论同工人运动相结合,开始重视在“实践”中探索“现实斗争”。他们也逐渐意识到成立组织和政党的必要性,1846年初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创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用科学的世界观对工人阶级进行武装,并同时与各种错误思潮展开斗争。1847年6月,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而《共产党宣言》正是马克思恩格斯为同盟所起草的政治纲领。因此,《宣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工人运动的首次结合,因而意味着真正的、现实的“斗争”的开始。随之而来的1848年欧洲革命,虽然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最后的果实也被资产阶级侵吞,但无产阶级参与了这一“斗争”,“这次革命到处都是由工人阶级干的;构筑街垒和流血牺牲的都是工人阶级”^③。“斗争”开启了欧洲各国工人的“共同国际行动”,也开始了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欧洲各国工人运动重新高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愈加紧密。1864年9月,“国际工人协会”在伦敦成立,马克思制定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1871年3月18日的巴黎工人起义和由此建立的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实践。革命虽然失败,但马克思恩格斯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深化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可见,马克思恩格斯视野中的“伟大斗争”具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斗争的两极性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尖锐对立和斗争,二是斗争的现实性即从理论批判向实践批判的转化。

20世纪以来,马克思恩格斯视野中的“斗争”在我国呈现新变化。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革命”似乎已经不再是主要任务,而“改革”和“发展”则成为当务之急。于是有人认为革命再无必要,阶级斗争已不存在。而事实上,一旦进入世界社会主义这一更加广阔视野,就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④。这个历史时代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阶级对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较量的时代,亦即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即便就国内来讲,《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66页。

已明确指出，“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①。这就充分表明，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甚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面对的问题不是“斗争”的有无问题，不是“革命”存在与否的问题，而是“斗争”“革命”的内容、形式、领域等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即“斗争”和“革命”形态已经发生转化的问题。

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呈现新形态。与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从理论批判转向实践批判的背景不同，今天的“斗争”所处的背景是：人们长期专注于发展经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被忽视，人们对于国际国内意识形态斗争的局势认识不清，警惕性放松。实际上，伴随着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国内改革的日益深入，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企图并未改变，不仅“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等不绝于耳，而且各种西方思潮打着“崇尚自由、追求民主”的幌子，直接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攻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习近平同志敏锐地洞察到意识形态斗争的紧迫性，在2013年8月19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②，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③。这些论述指明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根本性、战略性、全局性意义。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进一步强调，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④。唯其如此，才能保证“伟大斗争”的胜利。

政治领域斗争呈现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的是更加复杂且不断变化的世情、国情、党情，致使马克思恩格斯视野中的“斗争”在今天变得格外复杂多样，既存在于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也存在于党内与党外、国内与国外各个方面。国家层面的贸易战、反渗透，政党层面的清除腐败、从严治党，社会层面的深化改革、凝心聚力，无不是这一斗争的具体表现。特别是新时代以来，随着全面深化改革步入深水区，各种矛盾叠加，各种价值观并存碰撞，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风险隐患增加；中国共产党自身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相当严峻；更需要警惕的是，一些国外势力与国内势力相互勾结，图谋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妄图让我们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或改旗易帜的邪路；等等。这些事实证明，斗争的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斗争的方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斗争的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如此看来，170年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学说和革命学说在今天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展现出强大生命力。

因此，中国共产党既是执政党又是革命党，革命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仍然任重而道远。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⑤我们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积极应对来自各方面的风险与挑战，这本身就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所以，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建设——无论是全面深化改革之社会革命，抑或是党加强自身建设之自我革命——不过是无产阶级革命在新时代中国的转化形态。

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5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53页。

③ 《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03页。

④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1、15页。

⑤ 人民日报社评论部：《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1·5”重要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页。

二、伟大工程：现代社会系统工程建设在 新时代中国的关键性突破

对现代社会的反思、批判与重构是马克思恩格斯终其一生的重大探索。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现代”与“现代性”具有“现实矛盾困境”与“理想价值追求”的双重意蕴，其现代社会批判亦具有批判资本主义和建构新的现代社会的双重维度。他们毕生进行理论探索的目的就是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改造，力求寻找一条建构新的现代社会或曰共产主义社会的可能路径，为此全面分析并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发生发展、基本特征、矛盾困境、制约机制、理想图景、实现路径等一系列问题，形成了关于现代社会发展建设的系统思想。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把现代社会建设当作一项系统工程，在理论上对这项工程进行谋篇布局、顶层设计，也从实践上切实参与，提供具体指导。同时，在社会建设这项系统工程中，“党的建设”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关注。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现代社会工程建设的主体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依靠力量。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起来，成立与有产阶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使作为一个阶级的行动成为可能，“为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革命的最高目标——消灭阶级，无产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①。围绕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和建设，马克思恩格斯主要阐明了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明确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明了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②。通过共产党的领导实现工人阶级的国际联合，“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③；而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之后，通过党的领导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也是向无产阶级社会过渡的必要之举。其次，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本质区别。恩格斯说，“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④。这表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资产阶级政党的根本标志，同时也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本质特征。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在深刻洞见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真正代表无产阶级以及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要求，才能具有推翻一切剥削制度的勇气和彻底的革命精神，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政党。再次，制定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章程和组织原则。纲领是一个政党的性质和目标的体现，也是其团结阶级力量、赢得社会群众的思想基础，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⑤为此，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党的最近目的和最终目标、无产阶级专政等政治纲领，制定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和《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把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最后，强调党的领导和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同时也是过渡时期带领无产阶级巩固新生政权、建设新型社会主义国家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掌握领导权才能确保革命和建设的正确方向。而在此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9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5页。

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要进一步巩固阶级基础，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和办法来“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①。

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社会历史发展和现代社会建构的宏观视阈，分析了无产阶级政党与新型社会的关系，强调了党的建设在社会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但总的来讲，马克思恩格斯主要还是把党的建设作为现代社会建设系统工程中的一个要素来看待，还没有把党的建设本身作为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予以详尽分析。应该说，马克思恩格斯致力于建构的还是“现代社会的伟大工程”。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视野中的“伟大工程”主要表现为“重构现代社会的伟大工程”，那么中国共产党人则将其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工程”，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将其具体化为“治国理政的伟大工程”。尤为重要的是，习近平同志抓住了这一系统工程中最为重要的核心要素，将这一宏观系统工程聚焦于党的建设这一关键点，持续推进这一伟大工程：“这个伟大工程就是我们党正在深入推进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他强调，“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②。

党的建设之所以居于如此重要的地位，一方面是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之梦的必然之举，始终重视党的建设则是党永葆生机活力的重要法宝。因此，“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必须始终过硬”^③。另一方面，与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代极为不同的是，我们今天面对的主要不是如何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问题，而是执政党建设即管党治党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创立170多年之后，在中国共产党诞生98周年、执政70周年的今天，党的建设已经成为新时代治国理政系统工程建设的关键突破口。“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④，一些党员、干部在理想信念、工作能力、作风状况等方面处于亚健康状态，党内作风问题已经到了非抓不可的时候，特别是一些腐败分子贪腐严重、情节恶劣，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塌方式腐败。对于这些不正之风如果听之任之，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⑤。面对如此严峻而复杂的形势，只有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革新能力，提高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才能确保党的生机活力，确保党所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勇于自我革命，“面对党面临的重大风险考验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以顽强意志品质正风肃纪、反腐惩恶，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然而，党的建设方面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必须着力加以解决。加强党的建设，既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不断探索提高党执政的规律性和科学性，还要继续坚持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净化干部队伍，加强权力监督，严厉惩治腐败，“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定党性原则，勇于直面问题，敢于刮骨疗毒，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0页。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6、17页。

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6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4页。

⑤ 《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年，第34页。

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①。“把党的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②正是在推进党的建设这一伟大工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党的建设经验，科学把握执政党的建设规律，系统回答了在新时代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问题，明确了新时代管党治党的目的、原则、方针、总体布局、根本遵循、核心任务、着力点等内容，形成了系统化的党建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新发展，开辟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新境界。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共产主义事业在新时代中国的创造性推进

马克思恩格斯将共产主义视为一项伟大事业，指明了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实现伟大梦想应该依靠的力量，明确回答了这一伟大事业由谁完成、怎样完成的问题。早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就已提出无产阶级担负着实现人类解放伟大历史使命的思想，这也是马克思完全转向共产主义的重要标志。之后，马克思恩格斯通过《神圣家族》《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著作进一步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宣言》则再次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伟大事业”，而不能依靠其他阶级特别是“有教养的”阶级。恩格斯还专门区分了“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他看来，在当时，所谓社会主义者，主要包括以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傅立叶派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及不触及社会根本病症的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他们“站在工人阶级运动以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只有工人阶级中确信单纯政治变革还不够而公开表明必须根本改造全部社会的那一部分人”^③，才是共产主义者。可见，区分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主要标志就在于其所代表的是工人阶级还是“上流社会”。共产主义者代表的是工人阶级，共产主义是工人阶级“根本改造全部社会”的运动。“根本改造全部社会”是一项涉及整个现代社会重构的伟大工程，这一伟大工程就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伟大事业。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联合”，马克思恩格斯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④这种“联合”既是共产党人所追求的克服私有制、实现社会共同利益的结果，是共产主义的特征之一，同时也是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前提，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重要条件。无产阶级联合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在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刚刚发出这个号召的时候，响应者还寥寥无几；可是，到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的时候，全世界无产者“永久的联合”已经建立起来。即使国际在九年之后解散，它所创立的全世界无产者永久的联合却稳固地存在下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号召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同时，也看到了民族独立的重要性，他们强调，无产阶级国际联合是建立在民族独立基础上的，“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也不可能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⑤。

伟大的事业、伟大的联合离不开伟大思想的指引。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用以指导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8、16页。

②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3-2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3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页。

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通过引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精神发展来实现国际联合与共同斗争。马克思主义传播越广，说明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越广泛、越深入、越紧密。《宣言》在1848年之后以200多种文字、上千个版本在各国出版，发行量达数千万册，表明共产主义这一伟大思想在全世界获得了广泛传播，对各国工人阶级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宣言》成为全世界无产者的“共同纲领”。这样的影响和指引也惠及中国。在《宣言》发表170多年之后，中国用自己所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辉煌成就向全世界证明，《宣言》所阐明的伟大思想“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创造和开拓，是党和人民坚定不移践行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具有时代特色与民族特性，开辟了实现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的新方式、新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新局面，使科学社会主义在经历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在当代中国重新焕发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使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国取得了辉煌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新形势新问题，坚定不移高举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不懈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②，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些历史性变革，不仅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对人类的共产主义事业也具有深远意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并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新时代的新情况新问题，在这一进程中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展现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品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深刻的世界意义，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中国道路的借鉴，为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积累了丰富的中国经验。

四、伟大梦想：人类解放理想在新时代中国的阶段性实现

为人类求解放是马克思恩格斯毕生的伟大追求与伟大梦想，正如习近平同志的精准概括，“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③。回顾马克思一生的思想发展，“人类解放”成为贯穿其中的中心思想和中心线索。1844年发表的《论犹太人问题》在区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把人类解放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则探讨了人类解放如何实现、由什么社会力量来实现的问题，第一次阐明了无产阶级担负着实现人类解放的伟大历史使命的思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摆脱了纯粹的哲学思辨，开始向市民社会、向工人的劳动实践中去探寻人类解放的制约因素与实现途径；马克思恩格斯写作于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系统阐明的唯物史观充分论证了人的解放是现实的解放，而非仅仅是观念的解放，为指导人类解放的新世界观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宣言》对人类解放理想的认识更为成熟，表现在：从阶级斗争历史的角度阐明了为什么资产阶级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必然胜利，论证了共产主义的科学性和人类解放的必然性；通过回应与反击一些普遍性质疑和代表性观点，

①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1页。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8页。

③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8页。

对共产主义进行了具体设计和微观论证，使通向人类解放理想的途径更为清晰，更具实证性和可操作性。同时，梦想之所以“伟大”，不仅是因为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描绘与期待，更是基于对现实与理想之差距的正确认识，对实现理想的途径和依靠力量的科学认知，以及在认识到差距和艰难性以后仍然能够坚定信念，不忘初心，执着追求。唯其如此，才能把“伟大梦想”转化为“伟大事业”。

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梦想”是人类解放的梦想，而新时代中国人民的“伟大梦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二者有何关联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包括商业和工业在内的市民社会的物质交往，一方面是全球性的，另一方面，“它对外仍必须作为民族起作用，对内仍必须组成为国家”^①。这意味着，在现代社会，世界历史与民族国家同在，民族国家的存在是不容否认的事实，那么对一切问题的考察也必然要依据这一事实。“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②由于现代化与全球化相伴而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必然与民族解放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恩格斯在1892年《宣言》波兰文版序言中进一步看到民族复兴是国际联合的基础，他指出，“欧洲各民族的真诚的国际合作，只有当每个民族自己完全当家作主的时候才能实现”，波兰的独立是“实现欧洲各民族和谐的合作所必需的”^③，而且，这种独立只有依靠无产阶级才能争得，也只有无产阶级手里才能很好地保持住。在1893年《宣言》意大利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又以米兰革命和柏林革命使意大利和德国实现民族独立复兴为例，再次强调民族的独立统一是国际联合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解放与民族解放关系的论证表明，要实现人类解放的远大理想，首先要实现民族独立复兴的梦想。这样看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确立，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类解放伟大梦想在新时代中国的具象化表现和阶段性实现。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同志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次提出“中国梦”：“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④中华民族曾经以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雄踞世界，到了近代却沦落为失去民族独立、受西方列强欺凌的落后国家。无数中国人怀揣着民族复兴的梦想进行了各种尝试，但不管是地主阶级的“洋务梦”，还是资产阶级的“维新梦”“共和梦”，最终都失败破灭。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的梦想，社会主义建设的艰难探索为民族复兴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巨大成就为中国梦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我们已更加接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即将成为现实。

2018年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共产党宣言》及其时代意义举行第五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同志主持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我们要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统一起来、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统一起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不负共（下转第159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6页。